



一代人远去，一首诗永生：打工诗人的精神绝唱



序：不是“底层写作”，是时代的肉身书写

2026年春，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在昆山的街巷里完成又一单配送，手机语音备忘录里新增三行诗句。郑小琼的文字跨越国界，在海外书店被不同语言的读者诵读。两段看似无关的场景，共同延续着一场跨越四十年的文学长征。

三十年前，“打工诗人”还是带着泥土与机油味的陌生词汇。一群从乡村涌向城市的年轻人，置身流水线的轰鸣里、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、矿井的黑暗中，以捡来的烟盒纸、车间的废工单为载体，写下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最鲜活、最疼痛的文字。这群人奔赴写作，并非为了跻身诗人行列，而是生活的重量迫使其开口发声。就像陈年喜所言，“我写，是因为我有话要说”。

今日追问“中国最知名的二十位打工诗人今安在”，追问的并非一份简单的现状清单。真正值得探寻的是，那些曾在时代洪流中奔走的个体，在浪潮退去之后，如何安放自身的诗与人生。那些以血汗凝成的诗句，能否继续照亮当下打工者的前路。打工诗歌这一诞生于生存困境的文学现象，在今日依旧保有怎样的意义。

这二十位诗人，是打工诗歌的开创者、坚守者、转型者，也是默默承受代价的人。他们的命运，是中国打工群体命运的缩影。他们的文字，构成中国当代文学最具生命力的肉身书写。这群人从未被主流完全接纳，却以手中之笔，为两亿多打工者立言，为一个完整时代留下证词。

一、开山者：在荒原上种下第一粒诗的种子

1、许强：《打工诗人》的守夜人

2001年，广东东莞的一间出租屋里，四川渠县人许强创办民间诗报《打工诗人》。这份以蜡纸刻印、定价五角钱的诗报，成为无数打工诗人的精神家园。

二十五年过去，许强依旧是打工诗歌的守夜人。2026年1月，他的组诗《观察一根火柴》发表在《诗刊》上。诗中写道“它躺在火柴盒中，像躺在小小的棺材里，没有燃烧，本身就是一次死亡，或独身者的刑罚。”这句诗，恰如其分映现出许强二十五年的坚守。在文学的荒原之上，他甘愿做一根燃烧自己的火柴，为更多写作者照亮前路。

如今，许强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江苏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。他主编的《中国打工诗歌精粹》年度选本已出至第7本，发起的“中国打工诗歌奖”，成为打工诗人群体中的重要荣誉。他依旧居住在东莞，从当年的出租屋搬进老旧商品房，极少接受采访，大部分时间用于整理打工诗人作品，为默默无闻的写作者搭建平台。

“我只是个记录者。”许强坦言，“打工诗歌不属于我个人的成就，属于一代打工者的集体记忆。只要还有一位打工者坚持写作，这份诗报就会一直办下去。”

2、罗德远：打工诗歌的布道者

与许强并肩前行的，是四川泸州人罗德远。作为《打工诗人》发起者之一，罗德远始终致力于打工诗歌的推广与传承。

2026年，罗德远定居广州。他早已脱离佛山餐厅洗碗工的身份，成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、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同时担任2012年广东省新生代产业工人作家培训导师。报告文学《在广东，他们用诗歌吟唱生活》，入选广东省委宣传部主编的《不辞长作岭南人：广东省农民工模范事迹报告文学作品选》。

罗德远的写作，早已跳出打工题材的局限。文字里有广州的街巷、大湾区的变迁、打工者后代的成长。他从未忘记自己的来路，时常走进工厂、工地，为一线打工者开展文学讲座，引导更多人拿起笔写作。“诗歌未必能改变命运，却能重塑一个人的内心。”罗德远说，“一名打工者在流水线旁写下诗句，便不再是机器的附庸，而是拥有独立灵魂的人。”

3、安子：从“打工妹”到文化符号

1992年，《青春驿站——打工妹写真》问世，安子凭借这部作品，成为大众熟知的“中国第一打工妹作家”。这位来自广东梅州的姑娘，以亲身经历，记录第一代打工妹的梦想与迷茫。时光流转，安子早已告别深圳电子厂的打工生涯。她是安子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，被视作中国打工文学的标志性人物，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“中国改革贡献人物”。2026年，她发起的“安子打工文学奖”，依旧为年轻的打工诗人提供支持与鼓励。

“我书写的从来不是个人故事，而是一代打工妹的共同经历。”安子表示，“今天的打工者，拥有比我们更好的生活条件，也面临新的迷茫。我希望文字能为他们带去一丝力量。”

4、张伟明：“五位火枪手”的坚守

张伟明是广东打工文学早期“五位火枪手”之一，名字与打工文学的诞生紧密相连。这位梅州蕉岭作家，当年与林坚、安子、周崇贤、黎志扬并肩，以文字记录无根的漂泊与沉重的潇洒。

2026年，张伟明依旧在深圳坚持写作。作品从早期的打工题材，转向对城市与乡村关系的深层思考。他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，如同一位隐者，在深圳的城中

村里，默默记录时代的变迁。“打工文学不是一个标签，而是一种精神。”张伟明说，“这种精神，是身处艰难生活，依旧坚守梦想、坚持发声的勇气。”

二、巅峰者：把打工诗歌写进文学史

5、郑小琼：从流水线女工到《作品》杂志社副社长

2001年，21岁的四川南充姑娘郑小琼，背着破旧背包南下东莞打工。她先后进入鞋厂、家具厂、毛织厂，最终成为东莞一家电子厂的流水线工人，工号245。

机台上的日子重复而枯燥，她每天取下两斤多重的铁块，按下开关用超声波轧孔，最多一天完成一万三千多个孔。就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她开启了诗歌创作。文字里充满“铁”的意象，《铁》《女工记》《黄麻岭》等作品，如同锤子一次次敲击工业化时代的痛点。

多年沉淀与耕耘之后，郑小琼完成人生重要转身。她不再是车间里默默劳作的流水线工人，而是正式担任《作品》杂志社副社长，以专业文学出版人的身份，继续守护文学阵地，扶持更多基层写作者。

身份转变，并未改变她写作的底色与立场。她的文字依旧紧贴土地、紧贴劳动者、紧贴时代最真实的肌理。她的诗集被译成多种语言走向海外，作品登上国际文学平台，成为世界观察中国打工群体、理解中国工业化历程的重要窗口。

身处文学机构核心岗位，郑小琼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打工诗歌的意义不在于华丽的修辞，而在于真诚的生命体验。她始终保持对工厂、对劳动者、对城市边缘人群的关注，用编辑的眼光、诗人的敏感，守护那些来自生活深处的声音。

“诗歌的力量，来自真实，来自疼痛，也来自不肯低头的尊严。”郑小琼说。从流水线到编辑部，她走过的路，正是一代打工诗人最坚实的成长轨迹。

6、郭金牛：拒绝标签的网格管理员

2013年，湖北浠水人郭金牛站上第44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舞台，成为首位登上该舞台的中国农民工诗人。诗集《纸上还乡》斩获首届国际华文诗歌奖第一部诗集奖，先后被译成捷克语、德语、英语、荷兰语等多种语言。

郭金牛依旧居住在深圳龙华的城中村，一间30平米的出租屋，承载着他的生活与创作。日常身份是深圳龙华流动人口与出租屋综管所网格管理员，每天骑着旧单车，穿梭在密集楼宇之间，记录户籍与流动相关的各类信息。

“我不是底层诗人，我只是一名诗

人。”郭金牛强调，“标签会遮蔽文字背后复杂的生存与尊严。”他拒绝过多体制内工作机会，选择留在城中村，留在打工者群体之中。

2026年，郭金牛的诗歌创作从未中断。新作褪去早年的悲愤，多了对生活的冷静洞察。身边人偶尔调侃他“装大尾巴狼”，他却十分享受这种状态。白天做网格管理员，处理琐碎日常；夜晚回归诗人身份，在文字里安放灵魂。诗歌不是谋生职业，而是支撑内心的精神力量。

7、谢湘南：从“零点的搬运工”到文坛中坚

1997年，23岁的湖南耒阳人谢湘南，参加《诗刊》第14届“青春诗会”。诗集《零点的搬运工》入选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，斩获第七届广东省鲁迅文学奖。

早年的谢湘南，是深圳的建筑工、搬运工。零点的工地之上，他写下“我在零点搬运着城市的梦”。如今，他担任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罗湖区作家协会主席。2025年12月，他受邀为深圳市罗湖外语实验学校开展文学讲座，向爱好者赠送著作《深圳诗章》《谢湘南诗选》。

谢湘南的写作，从个体打工经历，转向对深圳这座城市的整体叙事。《流放历程》的经典作品。他从未忘记打工岁月赋予的底色。“我的诗，永远带着泥土和机油的味道。深圳是一座由打工者建成的城市，我的写作，就是为这座城市的建设者立传。”

8、陈年喜：从矿山爆破手到专职作家

“我炸裂过，也被炸裂过。”陈年喜代表作《炸裂志》里的句子，也是他人生最真实的写照。

1970年出生的陕西丹凤人陈年喜，拥有16年矿山爆破工经历。十六巷道的黑暗里，他目睹过工友被落石砸伤，失去手指与肋骨；见过年轻工友处理残炮时，瞬间被硝烟吞噬。他在炸药箱上写诗，床上枕下，铺满密密麻麻的诗稿。

2015年，严重的颈椎问题与尘肺病，迫使陈年喜离开矿山。如今他回到陕西丹凤故乡，成为一名专职作家。诗集《炸裂志》加印16次，发行量近10万册。散文集《微尘》《活着就是冲天一喊》，成为广受关注的畅销书。2026年1月，新作《去年天气今时衣》发表在《满族文学》第1期。

“我始终希望更多人了解我们这个群体，了解我们的生活与命运。”陈年喜说。他一边售卖家乡药材补贴家用，一边以文字构筑精神世界。微博里分享新作、故乡风景，偶尔吐槽生活琐碎，字里行间始终藏着不服输的韧劲。

三、新生代：新就业群体的诗意表达

9、王计兵：外卖骑手的低处飞行

2026年央视春晚舞台上，57岁的王计兵以新就业群体代表身份，为歌曲表演揭幕。这位江苏徐州人，是昆山外卖骑手，也是写下6000首诗的诗人。

1988年，王计兵作为第一代农民工赴沈阳务工，此后辗转工地、摊贩、废品回收等多个行业。2018年，50岁的他成为外卖骑手。送餐间隙，他用手机语音记录零散句子，抽空整理成完整诗作。2022年7月，诗歌《赶时间的人》在网络引发广泛关注，阅读量超两千万。

下转 07 版